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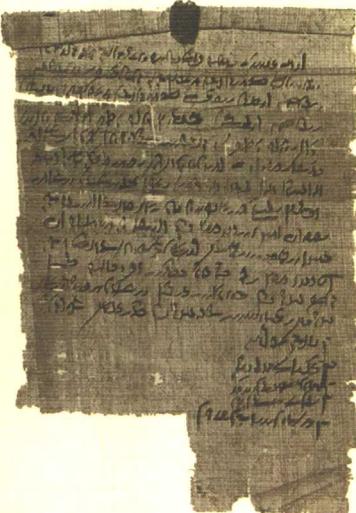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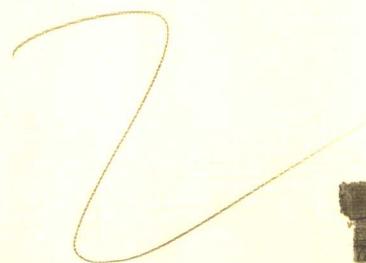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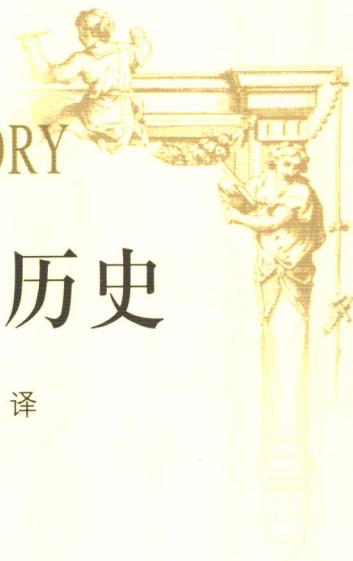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16

# READING PAPYRI, WRITING ANCIENT HISTORY

## 阅读纸草，书写历史

〔美〕罗杰·巴格诺尔 著 宋立宏 郑阳 译



上海三联书店

K86

7

2007



# 阅读纸草，书写历史

〔美〕罗杰·巴格诺尔 著 宋立宏 郑阳 译

READING PAPYRI,  
WRITING ANCIENT HISTORY



上海三联书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阅读纸草,书写历史 / [美]罗杰·巴格诺尔著;宋立宏,  
郑阳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7. 3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陈恒, 黄韬主编)  
ISBN 978 - 7 - 5426 - 2494 - 9

I. 阅… II. ①巴… ②宋… ③郑… III. 纸草学—研究  
IV. K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6380 号

## 阅读纸草,书写历史

---

著 者 / [美]罗杰·巴格诺尔  
译 者 / 宋立宏 郑 阳

责任编辑 / 王秦伟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林信忠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150 千字  
印 张 / 12

---

ISBN 978 - 7 - 5426 - 2494 - 9/C · 194  
定价: 22.00 元

# 总序

陈恒

自百余年前中国学术开始现代转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经几代学者不懈努力已取得了可观成就。学术翻译在其中功不可没，严复的开创之功自不必多说，民国时期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更大大促进了汉语学术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学人开眼看世界，知外域除坚船利器外尚有学问典章可资引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又开始了一轮至今势头不衰的引介国外学术著作之浪潮，这对中国知识界学术思想的积累和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可谓有目共睹。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同时，中国学者在某些领域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论著，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借此如株苗之嫁接，已生成糅合东西学术精义的果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企盼着，既有着自身深厚的民族传统为根基、呈现出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又吸纳了国际学术界多方面成果的学术研究，将会日益滋长繁荣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西方学术界自身的转型也越来越改变了其传统的学术形态和研究方法，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日益繁荣。研究方法、手段、内容日新月异，这些领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取向。不同学科的学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以求能开阔视野，迸发出学术灵感、思想火花。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合格的学术翻译队伍也日益扩大，

同时我们也深信,学术垃圾的泛滥只是当今学术生产面相之一隅,高质量、原创性的学术著作也在当今的学术中坚和默坐书斋的读书种子中不断产生。然囿于种种原因,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并不平衡,学术出版方面也有畸轻畸重的情形(比如国内还鲜有把国人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论文系统地引介到学术界)。

有鉴于此,我们计划组织出版“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将从译介西学成果、推出原创精品、整理已有典籍三方面展开。译介西学成果拟从西方近现代经典(自文艺复兴以来,但以二战前后的西学著作为主)、西方古代经典(文艺复兴前的西方原典)两方面着手;原创精品取“汉语思想系列”为范畴,不断向学术界推出汉语世界精品力作;整理已有典籍则以民国时期的翻译著作为主。现阶段我们拟从历史、考古、宗教、哲学、艺术等领域着手,在上述三个方面对学术宝库进行挖掘,从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以求为 21 世纪中国的学术大厦添一砖一瓦。

## 中文版序(2005年)

正如第一版序言所说，尽管本书出自多年来把纸草作为历史文书研究的经验，但它尤其关注了方法论，这种关注在拙作《晚期古代的埃及》(*Egypt in Late Antiquity*, 1993)中占据核心地位。在撰写那本书的过程中，我心里的想法清楚起来，值书稿接近完成之际，Richard Stoneman 邀请我写一本小书，谈谈怎样利用纸草作为古代史的证据。对计量方法的兴趣在本书中分量颇重，同样兴趣亦见于《罗马埃及的人口统计》(*The Demography of Roman Egypt*, 1994 年)，它也是我人生同一阶段的产物，尽管那本书的大部分量化工作由我的合作者 Bruce Frier 完成。

过去十年已将我的工作延伸到许多方面。我觉得无需因此大幅改动本书英文版的内容，所以不打算为中文版重写本书主体。但确实有必要提出若干简短的反思，正好借着写新序的机会陈述一番。

首要的想法来自撰写《古埃及妇女书信，公元前 300 年到公元 700 年》(*Women's Letters from Ancient Egypt, 300 BC-AD 700*)的漫长过程，此书辑录了译成英文的世俗体、希腊文和科普特语的纸草，连同评注和一篇长序，由我和 Raffaella Cribiore 合作。它不久将以两种形式面世，一为印刷书籍(由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为电子出版物(由美国学术协会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的历史电子书籍工程[History E-Book Project]出版)。后者将包括所有能得到的相关纸草和陶片的数码图像。大规模使用图像反映了该工程关注的一个焦点，也就是，如果把书信

当作实物和有笔迹可观的实例、而不仅仅当作看不到原件的文本，那么能够从中学到什么。我们试图用这种方式既研究书信的外在内容，又研究其内在内容，即它们被写在某个特定物体之上的方式。可以料想，有些结论是否定性的。例如，对于鉴别某种笔迹是出自女性还是出自男性、或者对于能否找到妇女的书信专用语的普遍特征，我们现在比刚入手时更不确定了。但也因此获得补偿，由于努力把书信当作人造材料考虑，我们已在微观历史的层面上取得丰硕发现。

这种努力并非势单力薄。它出现在这一背景之下：十年来，在实现通过互联网建立世界范围的纸草档案这个目标方面，已取得巨大进展。美国杜克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开创性努力已使众多机构的高级纸草学信息系统(Advanced Papyrological Information System, 简称 APIS)成立，目前它已经成了国际性项目。在过去十年中，我的部分精力就投在这个项目上。欧洲国家也有众多地方项目或联合项目，已将大量纸草和陶片的数码图片上网。(这些网站的链接可在 APIS 的网站上找到，参见总书目)现在已有成千上万的数码图片，更多图片正在被不断添加。在此过程中，纸草学越发成为一门将实物和实物上的一个或多个文本放在一起研究的学科。这既适用于文书类纸草和用于历史研究的纸草，也适用于文学类纸草，诚如 William A. Johnson 的近著《奥克西林库斯的书卷和抄写员》(*Bookrolls and Scribes in Oxyrhynchus*, Toronto, 2004)显示的那样。

这种发展很可能产生多方面影响，并超越传统的分类。与任何此类发展一样，其后果必然在价值上大小不同。对书面材料顶礼膜拜会走过头而误入歧途，这方面最醒目的例子是已故 Carsten Thiede 对摩德林学院(Magdalen College)所藏《马太福音》残卷的走火入魔的误导研究(参见 C. P. Thiede and Matthew D'Ancona, *Eyewitness to Jesus*, New York, 1996)。但此类越轨决不能减损关注实物的价值，更多、更严谨的关注实物对于理解文本在古代社会中的地位内涵丰富。

一旦实物成为要理解的核心史料，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会把注意力

同时转向书面材料的考古背景。相对而言,利用考古学阐释纸草的研究以前几乎没有,遑论用考古学和文本相互启发了,这部分是因为以往的有些发掘虽然发现了纸草,但相关记录通常很简陋或根本没有。就在我即将把本书第一版送到出版社之前,一篇文章出版了(van Minnen 1994),它提供线索,告诉人们还能从以往最好的发掘记录——即密歇根大学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卡拉尼斯的发掘记录——中重新获得什么。这方面仍大有可为。就算纸草或陶片来自垃圾堆而非来自居住环境,仍能通过把它们与当地考古遗迹结合起来而大有收获。近来一个极好例子是Hélène Cuvigny编辑出版的两卷本,涉及埃及东部沙漠的堡垒(*La route de Myos Hormos: l'armée romaine dans le désert oriental d'Égypte*, Cairo, 2003)。在一种小得多的方式上和有限的范围内,红海沿岸贝瑞尼斯(Berenike)的材料几乎完全出自早期的罗马垃圾堆,它们也因为被鉴定出一堆堆遭丢弃的陶片而获得一定意义(参看R. S. Bagnall, C. Helms, and A. Verhoogt, *Documents from Berenike I, Ostraka from the 1997 and 1998 Seasons*, Brussels, 2000)。

除贝瑞尼斯陶片以外,这种研究取向还对我个人独具意义。其一,就综合层面而言,体现于我和Dominic Rathbone合编的一本著作,题为《从亚历山大到科普特人的埃及:考古与历史指南》(*Egypt from Alexander to the Copts: An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Guide*, London, 2004)。在这本书中,纸草与社会史国际讨论班的成员把文书与考古学结合起来,为埃及游客(无论前往实地的还是摇椅中的游客)提供综合性背景知识,帮助他们理解从公元前4世纪到阿拉伯征服期间的埃及遗迹和社会。就更加切身相关的层面而言,从2004年起,我正在指导对阿美达(Amheida,古称特里米希斯[Trimithis])遗址的发掘,这是达赫莱绿洲项目的一部分。首先研究的主要建筑是一幢晚期的罗马别墅,目前已发现数量可观的陶片,开始让我获得一手经验,体会到试图把人造书写材料与其考古背景联系起来所涉及的复杂性。某些初步成果可参看我与G. Ruffini合作的《4世纪特里米希斯的市民生活》一文(“Civic Life in Fourth Century Trimithis,” *ZPE* 149

[2004] 143—152),我们在文中依据陶片讨论了这座房屋在其最后阶段的业主可能是谁,显然,这些陶片原来摆在庭院架子上,后来房屋遭废弃,架子被搬走,陶片就弃置在地上。

我的另一项工作也构成本书的基础,这是一个长期项目,目标是批判性考察古代对日常活动进行文书编写的模式;考察从埋葬到出版的考古学过程对于已发现和已出版纸草的性质有什么涵义;并考察这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从中产生了我们在今天出版物中发现的书面文书编写的模式。这个项目一直因为更紧迫的其他工作而踌躇不前,直到剑桥大学古典学系 2003 年邀请我发表格雷系列演讲 (J. H. Gray Lectures)、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古典学系接着邀请我在 2005 年秋季发表萨瑟系列演讲 (Sather Lectures),方才进入较活跃的阶段,得到较多优先考虑。我希望萨瑟系列演讲将在未来几年内构成这个主题写的一本书的基础,我在演讲中探讨了“希腊罗马时期东部的日常书写”的许多方面,议题举凡托勒密埃及就其书面文书的类型和范围而言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当作典型的希腊化社会(我认为程度非常大),一直到陶片在古代世界中的作用(在写篇幅短、生命短的文本时,陶片运用得非常广泛,这是只从考古发现的模式来考虑问题所远远想不到的)。这项工作再合适不过地加深了我对细心和敏锐抱有的敬意,我们必须以细心和敏锐来探讨文书与社会、政治及文化过程的关系。

最后,我要再次感谢 Richard Stoneman 邀请我撰写本书,并感谢刘津渝为促成中译本问世提供的帮助。

罗杰·巴格诺尔

2005 年 9 月书于加利福尼亞州伯克利

# 前　　言

纸草学通常是古代研究中技术性和实证性最强的学科之一。 vii  
这个特点无可非议地表现在：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以及古文书学和语文学<sup>1</sup>方面的专业技能来释读文本，而这些文本往往只有断编残简留存、且笔迹难懂。多数纸草学家除了识读、翻译和评注未出版的纸草，或者改进已出版的纸草，别无他求。但自 19 世纪晚期起，得益于乌尔里希·维尔肯奠定的基础，这个领域内的一些学者试图将纸草运用于更大的历史研究。最显著者莫过于借助纸草明确传统的事件叙述，哪怕只是通过“蠕虫的视野”，<sup>2</sup>但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现已持续了一个世纪，这在纸草学中已算不上新潮。就社会经济史的许多方面而言，纸草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古代史料，因此，利用纸草进行历史研究对于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古代世界，是极其重要的。

然而，给外行留下深刻印象的，常常不是纸草运用的宽广前景，倒是纸草学的封闭性质，以及多数纸草学家固步自封的倾向：他们不敢贸然跨越自己划定的学科界线。而多数外行也不愿意作技术方面的准备工作，这对于按照文本本身的情况来释读它们是必要的。<sup>3</sup>

---

1 译按：所谓“语文学”(philology)，类似我国的“小学”，下同。

2 纸草的这个方面本书不拟多加关注。“蠕虫的视野”一语出自 P. Parsons (1980) II，此文还举了来自私人书信的几个恰当例子。更多例子，尤其是罗马时期的，参看总书目第 11 部分所列的文章。

3 有一些优秀的例外，其中 Beaucamp (1990, 1992) 和 Kehoe (1992) 的著作令人瞩目。

我相信,这种封闭环境助长了一股未免有点草率的风气,使文书证据的利用和能否利用被想当然了,也使可以在什么程度上通过纸草得出结论这个真正的难题鲜有提及,更不用说明确讨论它了。  
viii 纸草学中的方法论探讨基本上还局限于对文本的编辑和考证。<sup>4</sup>

在过去几年内,两种力量推动我进行这种明确的讨论。首先是撰写《晚期古代的埃及》,它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于 1992 年完成。在这本书中,纸草占据核心地位,尽管我试图力求把纸草证据与其他类型的证据融为一体。写作此书促使我逐渐思考与这种证据的特点相关的问题,思考用它下结论时需要注意哪些局限。由此得到的经验产生了第二个动力,即一次名为“为文化求证:古代社会中写下和未写下的”小型会议,与会者包括纸草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文学学者,研究领域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到当代摩洛哥,大家一道谈论如何面对文书记载的沉默无语。这个大约二十人的团体尤其谈论了现存的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重构没有保存下来的,而致力于这种重构的其他途径又在多大程度上富有成效。

由于这两次经验,卢特里奇出版社让我写一本关于纸草的书的邀请就变得颇有吸引力。思考要说的内容,这个过程颇有助益,但也使我特别感到,起码对我而言,本书只是一个开端。我希望书中提出的某些问题能够激发更广泛的讨论,我也期待从由此产生的对话中学习。

一如既往,本书之撰写得到许多人的帮助,感谢他们向我提供了见解或有用的参考书目。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赫尔辛基大学于 1994 年 5 月邀请我去开讲座,使我得以将本书陈述的某些观点提出来; Maarit Kaimio 和她的同事让这次经历极其愉快。Alan

---

<sup>4</sup> 各种例外主要以简短评论的形式散落在大量研究论著中。对某些方面(尤其是文书编写的分析特征)的简要讨论参看 W. Peremans and E. vant Dack (1979)。Claire Préaux 的论文“纸草学和社会学”(C. Préaux 1959)尽管题目诱人,几乎没有任何方法论方面的内容。

## 前　　言

Bowman, Dirk Obbink, Leslie MacCoull 和 Bruce Nielsen 就本书草稿提出建议。我的母亲也帮助我消除了多处或暧昧或笨拙的段落。特此致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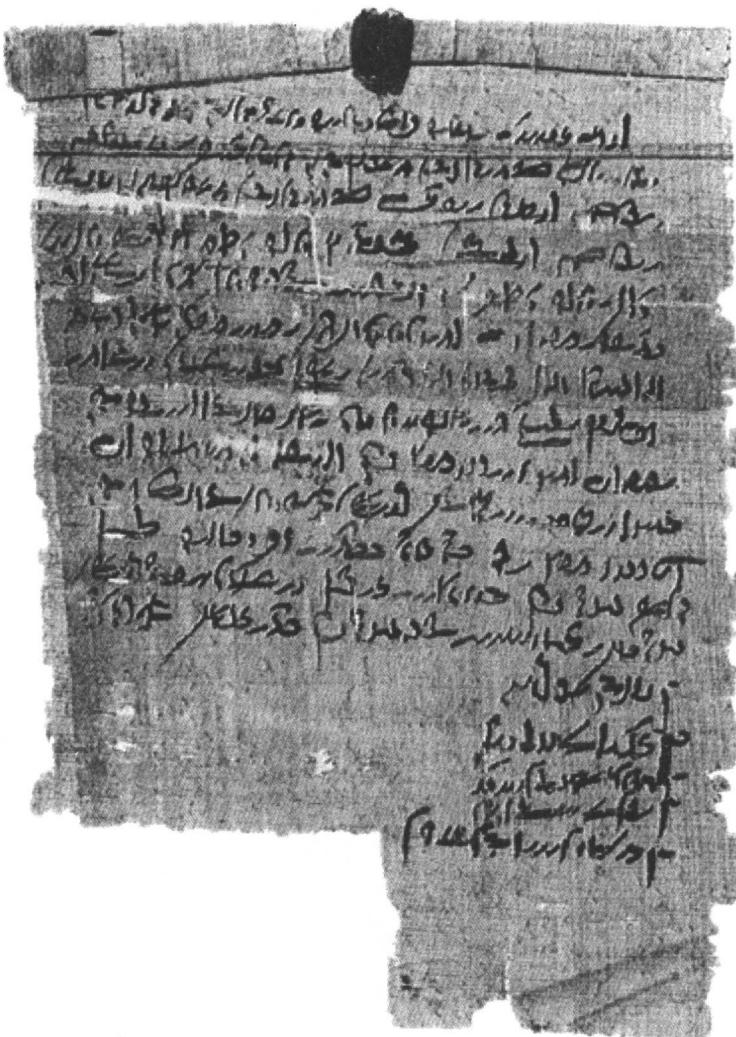
1995 年 1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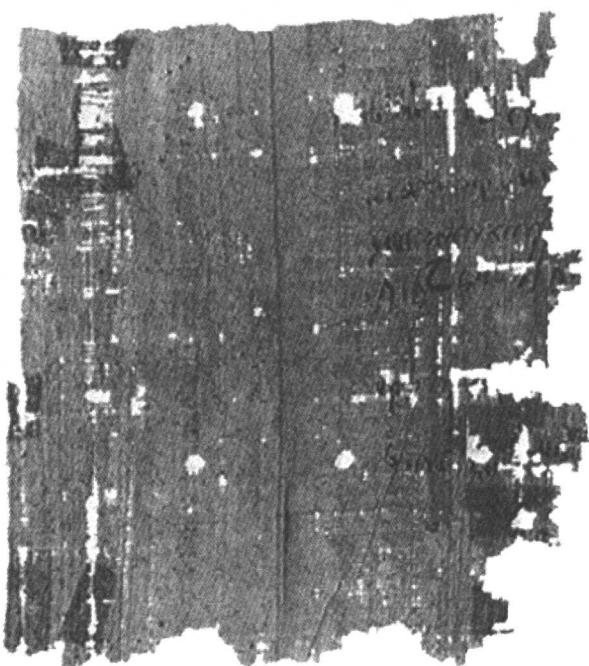
图版 1 泽农档案中的书信,写在从纸草卷上切下的长条上,写信人将纸草转过来沿着纤维的方向写。P. Col.  
Zen. 19, 公元前 257 年



图版 2 泽农档案中的书信,以灯心草而非芦苇制成的笔写就(参考 W. Clarysse, “Egyptian Scribes Writing Greek”, *Chronique d’Égypte* 68 [1993]186—201)。P. Col. Zen. 52, 约公元前 251 年



图版 3 用世俗体写的粮食借贷, 带有封印, 为反叛法老 Ankhonnophris 时期(公元前 201/200—前 187/186 年在位)之物。  
P. BM IV (Andrews) 19 (EA inv. 10831), 公元前 194 年



图版 4 希腊文的赠品契约(内文),反面有亚兰文和奈巴提文的签名。参看 H. Cotton, “The Archive of Salome Komäise Daughter of Levi: Another archive from the ‘Cave of the Letters’”, *ZPE* 105 (1995) 171—208, 公元 129 年



图版 5 一位乡村书记练习签名。P. Petaus 121 (P. Köln inv. 328), 约公元 184 年